

学术专论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 社会结构的变动

——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邓庆平

〔摘要〕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营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关键词〕旗地圈补 卫所屯田 州卫纠纷 一地两养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7)-04-0032-16

本文所论之“旗地圈补”，是指清代在直隶地区由于圈占旗地而形成的拨补地问题。学界在讨论清代旗地的形成时，大多会论及清朝初年直隶地区圈占旗地的过程，并提到针对被圈民地实行的拨补政策与由此形成的拨补地。^①但是，只有极少数学者注意到旗地圈补过程中涉及的清代处置明代卫所屯田问题。郭松义曾提及“直隶因为圈地的缘故，康熙年间也开始裁并（裁卫并屯）”，但并未进一步展开论述。^②毛亦可可在周藤吉之的研究基础之上，就被圈占、拨补旗地所涉及的卫所屯田所有制形态的改变进行了概述，关注点在卫所屯田的私有化历程，但并未讨论这一过程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③

〔收稿日期〕2017-06-05

〔作者简介〕邓庆平（1978-），女，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2249；ddqpp78@163.com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2015年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3JHQ031）、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项目（AoE/H-01/08）资助项目。

① 关于清代直隶地区拨补地问题的专论首推周藤吉之《清初に於ける畿輔の撥補地に就いて》一文，收入《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第279—317页；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清代旗地的研究论著也涉及这一问题，如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第48—68页；李华：《清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文史》第8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87—88页；衣保中、陈玉峰、李帆：《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67—76页；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20—123页；王立群：《民国时期清理河北旗地过程中拨补租地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② 郭松义：《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

③ 毛亦可：《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09—110页。

众所周知,明代卫所制度在清代仍延续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军屯是卫所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在清代的演变是考察明代卫所制度在清代如何变革的关键问题之一。一般认为,清朝对明代卫所屯田的处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漕运卫所,大多采取撤卫并屯的方式,即裁撤卫所,将屯田赋役归并州县,并调整屯田科则,与州县民地则例一体起科征解;另一类则是漕运卫所,为确保漕运需要,清代不仅将明代承担漕运任务的卫所保留下来,屯田也“隶卫如故”,即所谓的“贍运屯田”,这部分屯田大体按照计丁配田或以船派田的方式进行分配和管理。学界对于以上两类卫所屯田在清代的演变都做过相关研究,既有宏观性的制度梳理,^①也不乏细致的区域性个案研究。^②但笔者以为,清代直隶地区大量无漕卫所的屯田,是通过清初畿辅旗地的圈占和拨补,特别是以拨补地的形式,完成其改革过程的,这是清朝处理明代屯卫遗留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与其他区域的清代卫所屯田改革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都不同,而从前述周藤吉之等人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赵世瑜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曾以诸多个案指出应该用区域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明清易代史,其中便以清初圈占和拨补旗地时的州卫纠纷为例,证明其“无明不清”的研究立场,提醒研究者注意清初八旗圈地与明代历史的连续性及其复杂性,这一视角极具启发性。^③但其复杂性究竟如何,以及这一过程对清代直隶地区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清代直隶地区的旗地圈补置于明清卫所制度变革的框架内,并对由此引发的州卫纠纷和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调整等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以此呈现清代卫所变革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区域差异性。

一、清初直隶的拨补地与卫所屯田

清军入关后,为安置东来的满洲诸王、勋臣和八旗兵丁,从顺治元年开始,清廷便陆续在京畿圈占土地,“给予八旗下耕种”,一直持续到康熙年间,其间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前辈学者对这一过程已有细致的研究,笔者不再赘述。^④

① 郭松义:《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星斌夫:《明清时代交通史の研究》,后篇《清代漕运制度の展开》之二《运粮卫所の质的变化》,山川出版社,1971年,第266—300页;王毓铨、郭松义等:《中国屯垦史》下册,第五章《归并旧明卫所 实行“以屯济运”》,农业出版社,1991年,第277—307页;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修订版),第七章《运丁和屯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8—196页;毛亦可:《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第三章《屯田:数额与所有制》,第四章《屯粮:数额、科则与支用》,第86—160页。

② 于志嘉:《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2001年;陈曦:《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的处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施剑:《清前期贵州裁撤卫所后的屯田处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3期;谢湜:《“以屯易民”:明清南岭卫所军屯的演变与社会建构》,《文史》2014年第4期。

③ 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

④ 多数学者据《清世祖实录》记载的有关圈地的谕令和顺治十年户部尚书噶达洪的题本中所说的“头圈、二圈、终圈”(《户部尚书噶达洪题交民耕种之退圈地应照垦田例三年后起科事本》,顺治十年二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79—80页),认为清廷大规模圈地共三次:顺治元年、顺治二至三年、顺治三年底至四年初,如刘家驹:《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第49—51页;也有学者持顺治二至三年、四至十年及康熙三至八年的三次说,如左云鹏:《论清代旗地的形成、演变及其性质》,《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还有学者将清初直隶的圈地分为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的两次高潮,如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第106—113页。

按照清廷的最初设想，圈地是以明代皇庄、官庄及近京州县民人的无主荒田为主，但为了杜绝满汉杂处，加之随着旗人的不断入关，上述土地不够分配，所以圈占的土地渐及有主民地，并最终成为旗地的主要来源。^① 为了安抚京畿地区的被圈民户，清政府于顺治二年推行拨补政策，即“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② 顺治四年，清政府再次下令“被圈之民，于满洲未圈州县内，查屯卫等地拨补”，明确指出拨补地以屯卫之地为主。^③ 在清代直隶州县的方志中，也多有关于本地在清初经历旗地圈占和拨补的相关记载，方志编纂者大多直接将奉旨拨补之地称为“军地”或“卫地”，如庆都县“其被圈之地，拨附近军地补还”^④；永平府“旧有拨补之地，盖因停圈之后，民地乃被旗圈，奉旨以卫地拨补，还其被圈之地，如滦、乐被圈，或以抚宁、临榆卫地还之之类是也”^⑤；定县“诸卫屯田，分隶各县，而定独多，清代遂移为拨补之用”^⑥。

对于拨补地的数额，一些学者曾分别依据不同史料进行过统计，但由于资料所限或研究的兴趣点不同，他们并未关注拨补地亩中卫所屯田的情况。^⑦ 笔者对清代直隶各州县《赋役全书》中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但囿于资料和篇幅所限，无法对各被圈州县所获拨补地中涉及卫所屯田的具体情况进行逐一说明，只能选择拨补地中卫所屯田数额较多且记载较为详实的若干州县，对其进行初步统计，列表如下：^⑧

清初直隶部分州县拨补卫所屯田情况简表

被圈州县	拨补时间	拨补卫所	拨补地数（单位：顷）	总计（单位：顷）
顺天府文安县 ^⑨	顺治四年	定州卫	72.5	1992.91
	顺治四年	河间卫	190	
	顺治四年	大同卫	253	
	顺治四年	沈阳卫	109.5	
	顺治四年	真定卫	193	
	顺治四年	献县沈阳卫	969.84	
	顺治四年	献县河间卫	65.88	
	顺治四年	天津卫	139.19	
顺天府涿州 ^⑩	顺治三年	永清左卫	545.54	2971.8
	顺治三年	涿鹿左卫	675.7	
	顺治三年	景陵卫	72.62	
	顺治四年	献县沈阳卫	373.41	
	顺治四年	献县河间卫	529.34	
	顺治四年	献县大同卫	78.96	
	顺治四年	献县新增屯田	20	
	顺治四年	天津左卫	696.23	

① 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第120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己未。

③ 《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正月辛亥。

④ 康熙《庆都县志》卷2《赋役志·田赋》。

⑤ 光绪《临榆县志》卷15《赋役编·田赋》。

⑥ 民国《定县志》卷5《政典志·赋役篇上·田赋表》。

⑦ 周藤吉之：《清初に于ける畿輔の拨补地に就いて》，《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第288—297页；李华：《清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文史》第8辑，第88页；衣保中等：《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第72—75页。

⑧ 由于直隶各州县《赋役全书》中记载清初的屯田名色多样，很难清晰辨别是否为卫所屯田，且有些地区的记载不详，同时很多拨补地在顺治以后又经历了多次的退回或改卖，因而，笔者难以对清代直隶拨补地中的卫所屯田总数做出统计。

⑨ 康熙《顺天府霸州文安县赋役全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辑：《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44册，第394—409页。

⑩ 康熙《顺天府涿州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5册，第19—29页。

被圈州县	拨补时间	拨补卫所	拨补地数（单位：顷）	总计（单位：顷）
顺天府良乡县①	顺治四年	定州卫	195.14	1222.75
	顺治四年	定州草场籽粒地	150.7	
	顺治四年	定州忠顺营	312.67	
	顺治四年	定州腾骧卫	224.65	
	顺治四年	定州武功卫	17.50	
	顺治四年	定州神武卫	322.09	
顺天府香河县②	顺治四年	延庆卫	897.06	1310.07
	顺治四年	怀来卫	213.60	
	顺治四年	保安卫	195.21	
	顺治四年	永宁卫	4.2	
顺天府昌平州③	顺治四年	保安卫各所	1120	1120
顺天府通州④	顺治四年	宣府前卫	852.18	2205
	顺治四年	宣府左卫	425.92	
	顺治四年	宣府右卫	575.15	
	顺治四年	宣府深井堡	351.75	
顺天府遵化县⑤	顺治三年	遵化卫	370.81	2801.12
	顺治三年	东胜卫	1008	
	顺治三年	忠义卫	340.64	
	顺治三年	宽河所	73.64	
	顺治四年	兴州卫	876.54	
	顺治四年	忠义卫	116.82	
	顺治四年	三屯营	14.67	
顺天府平谷县⑥	顺治四年	延庆卫、永宁卫、保安卫、美峪所	406.28	406.28
永平府滦州⑦	顺治三年	永平卫	584.11	5060.87
	顺治三年	卢龙卫	999.9	
	顺治三年	东胜左卫	475.67	
	顺治三年	开平卫	462.7	
	顺治四年	抚宁卫	927.18	
	顺治四年	山海卫	1585.71	
	顺治四年	永平、东胜两卫草场下地	25.60	
保定府清苑县⑧	顺治四年	真定卫	1977.18	1977.18
保定府唐县⑨	顺治四年	真定卫	773.29	773.29
河间府河间县⑩	顺治四年	博野县屯卫	337.40	1022.32
	顺治四年	饶阳县神武卫	33.86	
	顺治四年	安平县定州卫	290.01	
	顺治四年	安平县神武卫	45.92	
	顺治四年	安平县河间卫	249.68	
	顺治十年	博野县屯卫、安平县河间卫、	45.73	
		饶阳县神武卫		
	顺治十七年	博野县屯卫	19.72	

- ① 康熙《顺天府良乡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5册，第287—291页。
- ② 康熙《顺天府香河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6册，第12—13页。
- ③ 康熙《顺天府昌平州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6册，第430页。
- ④ 康熙《顺天府通州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7册，第441页。
- ⑤ 康熙《顺天府蓟州遵化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9册，第14—15页。
- ⑥ 康熙《顺天府蓟州平谷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7册，第273页。
- ⑦ 顺治《滦州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50册，第509—528页。
- ⑧ 乾隆《直隶保定府清苑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14册，第396—397页。
- ⑨ 乾隆《直隶保定府唐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16册，第6页。
- ⑩ 顺治《河间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51册，第47—50页。

周藤吉之曾利用《直隶通省赋役全书》及方志资料，对顺治、康熙年间直隶地区各被圈州县所获拨补地亩的总数做过统计，如果以笔者上述表格中拨补卫所屯田的数据与周藤吉之的统计的总数进行对比，则可以大致了解卫所屯田在拨补地中占有的比重。下面就以拨补地数额最多的顺治四年为例，列表说明之：

顺治四年直隶部分州县拨补地亩中卫所屯田占比情况简表

被圈州县	所获拨补地总数① (单位：顷)	拨补卫所屯田数额 (单位：顷)	卫所屯田在拨补地亩中的占比
顺天府文安县	1992.91	1992.91	100%
顺天府涿州	2572.54	1697.94	66%
顺天府良乡县	1728.94	1222.75	70.7%
顺天府香河县	1310.07	1310.07	100%
顺天府昌平州	1120	1120	100%
顺天府通州	2205	2205	100%
顺天府遵化县②	1052.42 (1786.89)	1008.03	95.8%
顺天府平谷县	406.28	406.28	100%
永平府滦州	2547.98	2538.49	99.6%
保定府清苑县	2822.12	1977.18	70.1%
保定府唐县	773.29	773.29	100%
河间府河间县	1259.99	956.87	75.9%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见，卫所屯田在拨补地中的确占有很高的比重，顺天府的文安县、香河县、昌平州、通州、遵化县、平谷县以及永平府的滦州、保定府的唐县，在顺治四年获得的拨补地几乎全部为卫所屯田。那么，清初尤其是顺治年间以卫所屯田为主的拨补政策，对于这一时期直隶地区的卫所裁改过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学者在论及清代卫所制度时，大多将顺治三年十月朝廷批准的兵部上奏视为清代关于卫所改制最早的全国性政令，认为其体现了清代卫所的“民化”或“去军事化”过程。^③这一政令的内容是在不裁撤卫所的前提下，变革卫所武官的官制和卫军的户籍：“每卫设掌印官一员，兼理屯事，改为卫守备。千户改为卫千总，每所设一员，俱由部推。百户改为卫百总，每所设一员，由督抚选委……卫军改为屯丁。”^④如果以此作为清代卫所大规模改制的起点，那么顺治三、四年间清廷以大量卫所屯田作为直隶地区拨补地来源的做法，是否是朝廷为裁并卫所而有意识施行的举措？就笔者所见，目前尚无明确史料可以证明，但在顺治四年卫所屯田被大量拨补以后，直隶地区的卫所很快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归并：顺治七年，保安右卫、延庆右卫归并怀来卫；延庆左卫、永宁后所、四海冶所归并永宁卫。^⑤顺治九年，则有更多的卫所进行了裁撤和归并：

裁直隶镇朔卫、营州卫归并蓟州卫；东胜右卫、宽河所归并遵化卫；涿鹿左卫、中卫、兴州中屯卫归并涿鹿卫；抚宁卫归并山海卫；卢龙卫、东胜左卫、兴州右卫归并永平卫；密云后卫归并密云中卫；营州后卫归并兴州后屯卫；通州右卫、神武中卫、定边卫归并通州左卫；天津左卫、右卫归并天津卫；神武右卫、倒马、平定二所、唐山屯卫归并真定卫；保定

① 该数据来源于周藤吉之的统计，见《清初に於ける畿輔の拨补地に就いて》，《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第291—294页。

② 据康熙《顺天府蓟州遵化县赋役全书》，顺治四年拨补遵化县“迁安县太仓民社、民壮、勋戚、山场荒熟等地”778.16顷，其中抛荒免粮未认领地共734.47顷，周藤吉之的统计数据是含抛荒地在内的，若将之扣除，则遵化县顺治四年获拨补地亩数应为1052.42顷。

③ 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第15页；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第404—405页；毛亦可：《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第29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十月乙未。

⑤ 《清世祖实录》卷50，顺治七年九月己未。

中卫归并保定左卫；保定前卫、后卫归并保定右卫；裁营州左屯卫、渤海守御所、白洋口后所、镇罗关所、顺德守御所。^①

其中，很多卫所就是因为屯田被大量圈占或拨补，才很快完成了归并的过程。如天津、天津左、天津右三卫原辖地 9202 顷 43 亩零，因为圈地、拨补等原因三卫辖地只剩下 2000 余顷，于是在顺治九年合并为天津卫。^② 山海卫屯地“于顺治四年尽数拨补滦州”^③，抚宁卫“以卫地多拨补滦州”，故“省抚宁卫入山海卫”^④。因而，可以说，清初直隶地区圈占和拨补卫所屯田的做法，其初衷可能在于安置满洲和补偿被圈民户，但在实际效果上却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卫所改制进程。

二、拨补不易与州卫纠纷

众所周知，明代军屯不仅分布零散，与民地形成复杂的犬牙交错格局，屯田管理和子粒征收也呈现出极大的区域性差异，加之军屯制度发展到明中后期早已败坏不堪，出现了屯田私有化和“民田化”的倾向，屯田被大量占种、侵夺、转佃、民佃、典卖，军民因此连年构讼。^⑤ 换言之，明代卫所军屯的产权与经营方式都呈现相当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初。因此，清廷通过拨补屯田补偿被圈民户之举，涉及直隶地区卫所屯田的产权变更和经营方式的变化，这个过程势必问题重重，纠葛不休。

在拨补屯田时，被圈和拨补州县卫所面临的首要难题，是由于官员敷衍行事以及屯田分布零散、册籍登记混乱，导致了拨补地亩的丈量困难。奉旨获得拨补地土之初，被圈州县的地方官往往派里书和受补业主前往拨补州县卫所丈量、勘验拨补地亩。如武清县顺治二年被圈占近城田土 2274.16 顷，于顺治四年“将德州正、左二卫四十八屯，及抛荒之民地补还民人”，“随经知县肖芳巩钦差里书尚文举、张宠、王桂芳、李继茂带同各业主赴卫查认，文卷册籍，两处俱存”^⑥。但是，丈量、勘验屯田似乎并非易事。康熙初年，镶黄、正白两旗在调换旗地时，专管此事的户部尚书苏纳海就曾声称“屯地难于丈量，镶黄旗章京不肯受地”^⑦，并以此反对换地之举。如果说苏纳海本人是反对两旗调换旗地的代表人物，此说可能有夸大之嫌，那么真定卫屯田拨补庆都县的个案则更能证明屯田拨补在实际操作中的艰难：

国朝鼎革之初，圈占民间地土以畀从龙之众，诚为敦本固圉之至计也。其被圈之地，拨附近军地补还。无如奉行者草率从事，止提簿上之地，希完拨补之局，遂使良法美意不获实及。是被占者不毙于圈占，而毙于拨补也。即如庆邑所拨真定卫地，并不知坐落何处，其簿上四至，竟有以鸡犬、驴羊、春分、秋水种种不堪字样填写塞责，地既难于认种，不得不照簿议租，取归本县纳粮。诘料议租之后，竟有五、七年不得分文者，赔粮不已，于康熙十三年将地割退伊卫。但地虽归卫，而仓口未更，此项钱粮完欠考成，仍累庆邑官民。^⑧

由此可见，负责拨补之事的官员草率行事，对于拨补的屯田并不认真核查其坐落，登记册簿

① 《清世祖实录》卷 65，顺治九年六月丁未。

② 康熙《天津卫志》卷 2《赋役》，另可参见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第 21 页。

③ 光绪《临榆县志》卷 15《赋役编·田赋》。

④ 乾隆《临榆县志》卷 1《沿革》。按：顺治年间抚宁卫归并山海卫，后于乾隆二年，再割抚宁县东境，置临榆县。故明至清初山海卫、抚宁卫的相关史实多记载于清代《临榆县志》中。

⑤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编，中华书局，2009 年，第 304—369 页；于志嘉：《从〈辞〉看明末直豫晋交界地区的卫所军户与军民词讼》，《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4 分，2004 年。

⑥ 乾隆《武清县志》卷 2《拨补》。

⑦ 《清圣祖实录》卷 20，康熙五年十二月庚申。

⑧ 康熙《庆都县志》卷 2《赋役志·田赋》。

也是记载不详，所以，拨补屯田很难进行有效的丈量，导致业主无法实际认种拨补地亩，只能讨要地租，再回本县完纳赋税，但却多年取租不成，徒受赔粮之累。

除了丈量不清，拨补卫所的极力阻挠也是屯田拨补的主要障碍。顺治初年，滦州民地被大量圈占，后奉旨将抚宁、山海两卫的屯田拨补滦州民户，州、卫围绕拨补屯田的数额和归属，各执一端，互相争诘，构讼经年。此次事件的始末在顺治年间户部尚书车克的题本中被完整记录下来，极为详细，实属难得，为我们了解清初屯田拨补过程中的州、卫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① 以下是该事件的大致经过。

顺治八年，有抚宁、山海卫人林苍育上告，呈诉滦州被圈占土地 4200 顷，奉旨以永平、卢龙、东胜、开平四卫及卢龙、抚宁二县土地拨补，相比圈地亩数而言，拨补地多出了数千顷，其中还有抚宁、山海两卫屯田。按照林苍育的说法，据户部档册记录，拨补给滦州的土地本无抚、山二卫之地，但在顺治四年却被“滦奸李存心等假旨概行私夺”，不仅“侵渔国课，不输上供”，还向抚、山二卫的田主“追征租粮，私吞鲸腹”。因此，林苍育等人自顺治四年至七年连年兴讼，经户部查明后，审断“将有主地土断归两卫”，只将两卫“无主荒地”600 多顷“断给州民”。本来已经把问题解决清楚，但到顺治八年却有一些所谓的滦州“神奸”“倚仗投充”，贿买了几位满洲人，“假充大人，纠旗下叁百余人，蜂拥到卫，吊拷乡民，殴打印官”，硬将断结之地夺回，并“以壹亩折要肆亩”。林苍育等人于顺治八年七月间告御状，“敕下户部”重审。未料滦人贿赂书办“抟掇审官”，“将已断两卫之地土，翻然改断于滦民”。林苍育等人于十月间再次叩阍，痛陈“何得以州民而夺卫土，假投充而侵国课”，请求夺回卫地。

顺治八年十月，被告滦州人李存心反诉抚、山两卫的“污弁奸民”“抗悖霸地”。据李等人声称，滦州民地陆续被圈占 12000 余顷，“奉旨俱以卫地补偿”，并奉旨“查山海、抚宁两卫官地，无论荒熟有主无主尽数拨给”，即使这样，拨补之数仍“不足偿所圈之数”。卫地既已拨补给滦州，当然就是“滦产”，而两卫官“虑地土被拨，贪腹失其鱼肉”，于是就挑唆“明卫勋林苍育”等，令“阖卫粮头捱名逐户按粮计地”，凑够了 3400 两“使用银”，林苍育等人携此活动经费，“虚词渎奏”，欲将山、抚两卫及抚宁县“无主无名久远荒地”950 顷“换回熟地”。当然抚、山二卫人并不服气，林苍育回应称这是“投充变诈百出，部文反覆无定”，认为这些本来属于卫所的土地被滦人带地投充，甚至因牵涉旗地，部里的审案官员也多方推诿，处处阻挠，因而恳请把案子发给三法司去审理。针对林苍育的诘问“满洲圈地壹亩，仍作壹亩，如何滦州收补卫地肆亩折算壹亩”，滦人只能辩称“滦州地土原有上中下之分，今拨补地亩只凭公断”，言辞颇为含糊。

最终，经户部尚书车克再三研审，认定此案“其端起于拨补地土，其衅则皆卫棍林苍育所构也”。经查，滦州经过顺治三年、四年的两次圈地，前次圈占约 8370 余顷，后次圈占 4200 余顷，总额与滦州人所称一致。在顺治四年的圈占后，奉旨将山海卫屯田 1585 顷、抚宁卫屯田 925 顷拨补滦州，滦民将其中的 800 余顷投充两黄旗。而林苍育妄图“夺地还卫”，于是妄称滦州只圈 4200 余顷，拨补地数逾额。而户部顺治七年将拨补地土归还两卫的误断乃是因为主审官“止看肆年圈地档子，失看叁年圈地档子”所致。因此，断定两卫的屯田应归滦民，并认定林苍育上告滦民贿买旗人、拷民毆官等情，乃是“诬两黄旗下催租齐、刘、卢叁拨什库”，是“节节虚诬”，遵照律例，将林苍育发关外为民。

从《滦州赋役全书》和方志中的记载可知，户部的最终审断付诸了实施，两卫屯田确实如数拨补给了滦州。假设我们相信户部最终审定结果为事实真相，那么两卫千方百计、甚至不惜“捏词虚诬”以求夺回卫地的缘由，似乎并不难理解。考察此次土地争讦始末，除是否补足圈占

^① 《户部尚书车克题直隶永平为圈补土地与滦州涉讼事本》，顺治十年四月初二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4 辑，第 94—100 页。

之数外，抚、山两卫拨补屯田之“有主无主”也是争议的焦点，双方各执一词：卫民认为拨补屯田涉及到了“有主土地”，岂可“州民而夺卫土”；而滦民则认为朝廷下令拨补之时是“无论荒熟有主无主尽数拨给”。问题的根结所在，恐怕正是在于屯田是否“有主”的认定上。顺治年间，朝廷下令以屯田拨补被圈州县，指明为“无主屯地”，所谓“凡裁革卫所及入官一应地土”，方令拨补，重在屯田的“无主”和“官田”特性，其原意应在杜绝争端。^①但明代军屯的转佃和民佃现象早在明中叶以来就极为严重，不仅屯军可以将其份地转佃与人耕种，坐收私租，甚至官府也会将逃亡屯军遗下、抛荒以及屯军因各种原因不能耕种的屯田，召民承佃，办纳屯田子粒。因此，名义上是官田的卫所屯田早就出现了私有化的倾向，所谓的“无主”，只是作为分地所有者的名义上的“祖军”早就物是人非，而屯田的实际耕种者承佃已久，已将屯田视同己业。^②因而，军屯所有权和经营权长期分离、产权难于界定的现象早已存在经年，这种状况延续至清初，屯田拨补中的难题也就不可避免。乾隆年间的永平府知府在处理本府拨补地事宜出具的告示中，论及清初拨补地的缘由，曾指出拨补举措施行不易的症结，全在“卫地典卖任民，已成世业”^③，可谓一语中的。

在清初直隶地区拨补卫所屯田的过程中，类似抚、山二卫与滦州之间围绕拨补地亩的争端和拉锯，应该不是个例。如顺天府东安县“圈去地亩原补德州卫五所屯地，照数令民兑认……卫地不拨县民，并无兑认，无凭开报”^④。清代直隶地区的一些族谱中也保留了此类纠纷的记载。如直隶易州的陈氏宗族，在清初时就被圈占土地，后获得万全都司蔚州卫的屯田作为拨补地，而后经营三十余年，期间屡遭讼端，历尽各种艰辛，实属不易：

国朝定鼎于京师，畿辅腴膏圈给从龙将士，前之负郭田园所余无几……幸世祖悯念被圈予遗，于顺治九年拨补宣镇即今宣化府蔚州卫即今蔚县军地十余顷，自是微有起色，经营三十余年……其中迭遭丧变讼端，历尽困厄险阻，难以备述。^⑤

从上述各例可知，清初以卫所屯田拨补直隶各被圈州县的举措引发了诸多纠纷，而从结果来看，来自诸如真定、抚宁、山海、蔚州等卫所的阻力，似乎并未阻遏这一进程的推动。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拿到了拨补屯田的受补业主们，真的就可以顺利获得补偿吗？换言之，既然有这样的争端在先，受补业主与原田主或原佃户又将如何在后续的土地经营实践中协商共处呢？

三、“一地两养”与拨补地的经营方式

在拨补政策推行之初，按照制度规定，拨补地一旦划归受补业主，田赋将由新业主在受补州县承纳，但由于受补州县与拨补地所在州县卫所往往相隔较远，所以管业很是不易。从现有史料来看，受补业主经营拨补地的方式一般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由于经管困难，受补业主最终将拨补地亩退归拨补州县卫所，或者由拨补州县卫所的原田主买回，相应的田赋也就改归拨补州县卫所征解。

顺治十年五月，户部曾下令“拨补地亩听从民便，情愿退随过彼处纳粮，本县钱粮即行开除”^⑥。此后，顺、康两朝，大量拨补地便以“退随”“退回”“买回”等方式被改归拨补州县卫所，这在直隶各州县的《赋役全书》中有很多记载，如保定府清苑县在顺治四年获得真定卫屯

① 袁懋德：《请严遏抗以除民累疏》，载《皇清奏议》卷13，《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② 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编，第304—369页。

③ 光绪《临榆县志》卷15《赋役编·田赋》。

④ 康熙《顺天府东安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5册，第644页。

⑤ 《易州陈氏宗谱·重修宗谱旧叙》，清嘉庆刻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⑥ 康熙《顺天府固安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5册，第389—390页。

田 1977.18 顷，就于康熙四十一年八月由真定县全部买回。^① 由于此种方式中的拨补地已被退回或改买，田赋也改归原州县卫所征解，受补业主与受补州县对于这些已退回的拨补地，再无管业、经营和缴纳田赋等问题，换言之，一旦被退回或改买，这类土地就不再是拨补地了。因此，拨补地亩的经营方式，实际上只有其余两种：

第二种，受补业主举家迁居拨补州县卫所，自耕纳粮，如“涿州受补景、献、津等处地亩，向缘地棍负隅霸措，涿民系移居就业，自种完粮”^②。

第三种，仍由拨补州县卫所的原田主或原佃户耕种拨补地亩，受补业主讨取地租，再在受补州县完纳田赋。此种经营方式在直隶各受补州县极为普遍，如怀柔县民地“被圈，士民失业，幸邀拨补、兑补，得以少偿。然所拨之地，距怀甚远，民既不能赴地耕种，势必召佃取租，以完本邑之赋”^③；又如良乡县“邑中田地圈给京旗，存剩者十不及一，余皆受补定州。定去邑数百里，良民无力就耕，部议令定民佃种，输租于良”^④；再如密云县“顺治四年又奉部文拨补邻境口西、延庆、保安卫屯地，补本县民地五百三十二顷……地方隔属，难以管业，其地仍系彼处原主耕种，密邑士民仅止讨租以办国课”^⑤。

正如康熙二十八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在其所题关于保定府拨补地亩的题本中所说：“直隶永、保、河等属民地圈给旗下，将别州县卫额外开垦官屯等地拨给失业人民，在受补者即为世守之业矣。唯因地居隔属，有挈眷自耕纳粮者，有讨租完纳者，亦有租内扣除代完者，原不画一。”^⑥ 于成龙所说的“挈眷自耕纳粮”，即为上文所述第二种方式；而“讨租完纳”和“租内扣除代完”则是第三种方式的不同表现形式。

从直隶地区现存方志资料来看，第二种方式远不及第三种方式普及，其原因正如上述史料所言，在于受补州县与拨补州县卫所之间相隔较远，受补业主一般不愿举家离乡背井，迁往拨补地居住自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卫地典卖任民，已成世业”这一点。作为拨补地的卫所屯田，虽然其耕种者可能早已不是最初获封军屯分地的祖军的后裔，但由于被多次典卖或转租，这些屯田已被现有田主或耕种者视为“世业”，他们也不愿或无法离开这些土地。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受补和拨补州县卫所大多采取了既承认军屯被典卖或长期佃种因而“已成世业”的现状，又默认能解决业主受补取租需求的“一地两养”方式，即“被圈之民，隔远耕种，亦有未便，故又令现种卫地之家，出租以与被圈之民，所谓一地两养也”^⑦。因此，我们可以将上述拨补地经营的第三种方式统称为“一地两养”，这也是清代直隶拨补地亩最常见的经营方式。

以抚、山二卫拨补滦州的屯地为例，“一地两养”的具体做法是：“地仍系临民原产，特滦民按亩收租，所收之租，以十之三封粮完官，十之七带回养家。临民种地出租，而不封粮；滦民食租封粮，而不准夺地。”这样，“在受补者得租原轻，而在奉拨者亦未失业”。为保证这一经营方式的顺利施行，地方官府规定“受补者不得加租及重价转行典卖，而奉拨者不得短少原租及

① 乾隆《直隶保定府清苑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14册，第396—397页。这类例子非常多，可以参见周藤吉之：《清初に于ける畿輔の拨补地に就いて》，《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第300—306页。

② 《保定府为敬陈地方等事本》，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文汇编》第5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第2459页。原书编者将该题本与另一康熙三年题奏蔚州卫拨补地的题本合并命名为《拨补蔚地详请老底》，题名应当有误。

③ 康熙《怀柔县新志》卷4《赋役》。

④ 光绪《良乡县志》卷3《赋役志·田赋》。

⑤ 康熙《顺天府昌平州密云县赋役全书》，《明清赋役全书》第1编，第47册，第152—154页。

⑥ 《保定府为敬陈地方等事本》，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清代（未刊）上谕、奏疏、公牍、电文汇编》第5册，第2454页。

⑦ 光绪《临榆县志》卷15《赋役编·田赋》。

任意措勒”。直到乾隆十四年，永平府知府就“一地两养”的地租问题出示晓谕时，仍称：“凡有拨补地亩，各遵成例交收原租。或有受补之家不照原租典卖，及典卖之主妄想加租者，各治其罪。如有奉拨之家，倚恃隔远，抗租不交，即呈官立拘，责惩押完。则奉拨、受补各安其分，而词讼亦减一种矣。”^①

概言之，“一地两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旧佃户在拨补土地上耕作，但不承担该地亩的田赋，而是向业主交租，业主食租纳赋；二是为减少争端，官府要求佃户不能抗租措欠，同时业主也不能增租夺地。虽然官府为业主与佃户设计了理想的共处模式，其用意在于减少词讼，但“一地两养”方式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各种问题，特别是当拨补地为卫所屯田时，管业似乎尤其困难。顺治十六年，兵科右给事中袁懋德上疏奏陈卫所屯田拨补后，受拨业主在获取补偿中的种种困难，因其常年生活于畿辅地区，有着亲身体验，所言也甚是切中肯綮：

我皇上因通州、香河、灤县等各州县圈占之后，民不聊生，故查腹内如德州、兴济、静海等处，关外如保安、延庆、永宁、怀来等处，凡裁革卫所及入官一应地土拨补，使失业之民，得有恒产……但所拨之地，远者七、八百里，近者亦三、四百里，彼处既无房屋以栖身，又无农具以资用，势不得不仍归旧佃……查得拨补佃户，非卫所之刁军，即原佃之悍辈也，性成习惯，事熟人顽，百计留难，乃其夙智。况有积棍衙蠹交结把持，将多作寡，指稔为荒，刁措横挠，诚难枚举。且路隔数百里，往来之资斧维艰，或多方借贷以往，而逐户催求，沿门持钵，奔波劳碌，计所得之锱铢，不足供殍于朝夕矣。且闻有地主苦钱粮之无措，畏债欠之难偿，流落他方，经年不得归者；有赀粮已尽，饥谨焦劳，束手无策，竟客死于道路者；有欺其伶仃孤弱，而痛遭其毒打者；有兴词构讼，告诉经年，而漂泊无归者；种种苦情，郑图难绘。^②

在袁懋德看来，受补业主经营拨补地亩的困难有三：

一是受补业主居所与拨补之地距离遥远，难以亲赴拨补之地居住、耕种，只能由原佃户继续耕种，业主讨租纳赋。但由于路途遥远，受补业主每年远赴他乡讨租，长途跋涉且往返路费甚巨，艰辛异常；

二是拨补地的耕种者要么是卫所刁军，要么是泼悍的原籍佃户，因而“事熟人顽”，抗租措欠，极难应付；

三是拨补佃户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交结“积棍衙蠹”，在丈量、申报拨补地土的多寡和荒熟时，上下其手，弄虚作假。

因此，受补业主既受累于应付本地的钱粮差役，又无力催讨拨补地土之租，无奈之下，只能连年兴讼，种种苦情，难于历数。这类情形在清代直隶各受补州县极为常见，如受拨德州正、左二卫屯地的武清县，业主虽已赴卫勘验土地，存有“文卷册籍”，但一到收租之时，“屯卫佃丁又恃土著而欺流移，抗租交控，胶葛不休，遂至有拨补之名，无拨补之实”^③；又如良乡受补定州卫屯地，“受补之民，虽有拨补之地，而承种之佃户，因受补人等俱在异乡，刁措多端，劣衿地棍或私为典当，或通同霸占”^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熙年间，直隶各州县陆续制定了“代征移解”之法^⑤，又有“就租扣粮”^⑥、“官征官解”^⑦等法，即由拨补州县卫所的地方官代为收租，再移交给受补州县的官府

① 光绪《临榆县志》卷15《赋役编·田赋》。

② 袁懋德：《请严遏抗以除民累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第133—134页。

③ 乾隆《武清县志》卷2《拨补》。

④ 光绪《良乡县志》卷3《赋役志·田赋》。

⑤ 康熙《怀柔县新志》卷4《赋役》。

⑥ 乾隆《无极县志》卷4《田赋》。

⑦ 光绪《畿辅通志》卷191《宦绩九·柯愿》。

或业主；或者拨补地亩的应纳钱粮，亦由拨补州县从代征的租银中扣留，径行起解，剩余租银再移交受补州县，分发各业主收领。但是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究其原因，则在于“受补各地佃户措租，经征之有司，因租系给民之项，无关考成，偏护己民，不为追比，徒有补地之虚名，全无得租之实惠”，于是，康熙三十年，直隶巡抚郭世隆题请“将代征各官照催征钱粮之例，量从轻减，另定一例，以为考成”，即将代征租银也计入拨补州县地方官员的考成中。^①乾隆三年以后，直隶各受补州县拨补地的应纳钱粮，则一律依据寄庄寄粮的新规，即“寄庄寄粮民屯田地，应征粮米等项，自丙辰年（即乾隆元年）为始悉更正，就近征粮，按额报解”^②，改归拨补州县一体征解。^③

但是，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未彻底解决佃户抗租的问题，据学者研究，直至晚清，直隶各地因拨补地亩而发生的佃户抗租事件仍在不断发生，积案如山。^④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的受补州县在实行“代征移解”之前，许多无力讨取租银的业主，将受补土地委托本地大户，由大户包揽收租纳赋，而实行官征官解之后，众地户又纷纷反悔，希望取回各自的收租权，因此产生了新的诉讼纠纷。如康熙《怀柔县新志》记载：

先是，未定代征之先，众地户零星受补者，艰于取租，苦于赔赋，因归并于一二稍有力之家，令其总揽收租完赋。自官征以来，租无逋欠，完课之外，得有余利，于是向之拱手让人者，复兴词争讼，连年不休。余审讯之下，见有向年各地户情愿归并印照，实难翻案。但其初原系该里各户公产，因令总揽收租者，每年于余租内量给该里众户银十两，以为差徭公费，庶几情理之平。业已允服遵断，既又反复，至今尚未息讼云。^⑤

从上述讨论可知，拨补地的“一地两养”方式，造成了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的变化。同时，由于受补业主与拨补地亩所在地的空间隔离，也产生了清代直隶地区围绕业主与佃户的拨补地租问题形成的大规模的跨县域的经济联系。而为了解决拨补地租的收取、拨补地亩田赋的征解等难题，直隶各州县从康熙年间开始陆续施行的一系列以官征官解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措施，又催生了一套以地租代征事务为主的新的州县财政体制。这套体制一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仍然在持续发挥作用，并产生了一种新的基层社会组织——租社。如获鹿、藁城、真定等地拨补徐水县的地亩，由于拨补地租由拨补州县代征，再移交徐水县分发业主，因而形成了徐水租社，即“当初租银解到时，由县署当堂按户分给，后恐日久弊生，改由绅士经理具领转发，不经胥吏之手，此徐水租社之所由立也”^⑥。对于州县代征地租的财政体制的具体运转情况，以及由此形成的租社等基层社会组织的构成、运作等相关内容，限于本文的篇幅与主题，笔者已另撰他文加以讨论。

四、从“卫勋”到“旗势”

除了“一地两养”方式引发的土地制度与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外，清初直隶地区拨补卫所屯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应对之策、处理结果，还体现出另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过程，即地

① 光绪《良乡县志》卷3《赋役志·田赋》。

② 《皇朝文献通考》卷3《田赋考三·田赋之制》。

③ 有关清初至清中叶拨补地的赋税征收政策，周藤吉之有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清初に于ける畿輔の拨补地に就いて》，《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第298—308页。

④ 李华：《清初的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文史》第8辑，第92页。

⑤ 康熙《怀柔县新志》卷4《赋役》。

⑥ 《直隶保定道属旗地圈租清理处训令第197号》，河北省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政务档案，档案号：656-2-970，转引自王立群：《民国时期清理河北旗地过程中拨补租地初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方社会权力结构与人群组织方式的变化。

让我们再回到抚、山二卫与滦州的争地纠纷，按照原、被两造的供词，两卫掌印官郭之俊、杨汝成和“明朝卫勋”林苍育是推动这场夺地之争的主导力量。^①而滦州方面，则是倚仗旗势的投充民人，即所谓的“滦州神奸”等人，成为对抗方的主要代表人物，并最终成功实现了案件审断结果的扭转。换言之，双方各自倚靠了源于明代卫所和清代八旗的两股势力，这分别代表着明清两朝直隶地区对地方社会极具影响力的两种力量，而案件的最终走向也与新旧两种力量消长和更迭的趋势暗合。

滦州地处山海关以西，明代其境周围遍布卫所，境内安插有邻近各卫的军人，军民长期杂处，地方官受困于卫所“豪军”之难于管治，亦是由来已久。弘治元年，滦州知州潘龄就曾上奏，称“本州东接山海关，南抵海口，西通京师大路，北近刘家等营。具安插永（丰）[平]、卢龙、东胜左、开平中屯、忠义中等卫，与民杂处。有等强军欺害良民、动辄持枪执刀，莫敢相较。及至事发，却又脱避。差人拘审，结党抗拒。又有本州民人，或因拖欠粮草，或犯轻重罪名，一遇勾摄，逃入军屯，被其隐护”，因此上奏刑部，请求照浙江严州府同知张升所奏行事例一体办理，即“凡军、旗、舍、余有犯，径自拘拿发落”，将辖境内卫所军户的缉拿审讯权收归滦州知州。但刑部认为“揆之律例，俱有违碍”，仍“行各边军卫有司衙门：今后凡遇军民词讼相干涉者，仍要会问”，即坚持涉及军民的词讼纠纷，仍令州卫有司依律约问，共同审理。^②

明代直隶地区虽为京畿，但盗贼却极为猖獗，社会治安状况并不理想。如成化二十年，保定巡抚就曾奏称：“河间、保定等府地方，军地杂处，盗贼易生，比之他处，其实众多。”^③所以，滦州知州遇见的情况绝非个例。据 David Robinson 的分析，造成京畿盗乱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区域内大量人口的频繁流动、宦官势力、安置于此的蒙古军人后裔的尚武传统，以及密集的皇庄、卫所导致的管辖不力等，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京畿地区因军民杂处带来的行政和司法管理上的困难。他用大量的实例证明，那些在京畿地区活跃的盗贼，很多都是卫所的军户，或者是一些避入军中的奸佞之徒，他们逃避差役，精于骑射，结成团伙以抢劫为生，而一旦官府要缉拿他们，卫所武官以及武官所倚靠的官府势力便构成一张张巨大的庇护网络，这种私人庇护关系的发展使得国家弭盗的措施难以执行，所以卫所制度带来的地方管理体制上的痼疾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了京畿地区盗贼之祸的结构性因素。^④近几年来，Michael Szonyi 借用“制度套利”和“日常政治”等概念和理论，倡导以“新制度史”的角度重新解读明代卫所军户制度，他用军户族谱、碑刻中的若干明清军户个案，以向国家“套利”作为比喻，将明代卫所军户制度视为一种民众自下而上获取利益的策略。^⑤上引滦州知州所说的“强军欺害良民”和本州民人“一遇勾

① 据方志的记载，郭之俊和杨汝成分别是顺治初年山海、抚宁二卫的守备。山海卫守备郭之俊因“慷慨有为，清正不苟，爱民如子，理政事如治家务”，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见乾隆《临榆县志》卷8《职官·宦绩》；抚宁卫历代武职在方志中记载颇略，错漏甚多，顺治年间仅记守备杨守成一人，恐为“杨汝成”之误；“卫勋”林苍育则是明天启朝在任、顺治年间已卸任的抚宁卫掌印指挥，均见光绪《抚宁县志》卷10《职官》。

② 《刑部左侍郎程等题为豪军为害事本》，弘治元年二月初六日，《皇明条法事类纂》卷40，“14. 在外约问军民词讼止会附近其有（杭）【抗】（矩）【拒】占吝等项参提（门）【问】罪”条，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下，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35—637页。

③ 《户部等衙门尚书（等）殷等题本》，成化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4，“21. 【窃】盗（贼）接手三犯以上充军”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5册上，第371页。

④ David Robinson, *Bandits, Eunuchs, and the Son of Heaven: Rebellion and the Economy of Violence in Mid-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p. 27-68.

⑤ Michael Szonyi 的说法，目前只见到其演讲报道，如他在台湾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组织的演讲《明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卫所和军户：国家制度与日常政治》，见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网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254。另可参见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23页。

摄,逃入军屯,被其隐护”等情况,都可以借用 David Robinson 和 Michael Szonyi 的上述观点加以理解。

在清初抚、山两卫与滦州的争地纠纷中,阖卫粮头捱户计粮收取诉讼期间的使用银两,委托现任及前任掌印卫官连年兴讼甚至多次告御状,可见卫所体制下形成的私人庇护关系和政治活动能力依然发挥着作用。而滦州方面,由于土地被旗人圈占,以及滦州民户的带地投充,使得旗人势力介入,借助这种来自新朝的强势力量,最终在土地诉讼纠纷中获胜。从其后滦州各类田土纠纷来看,倚靠旗势已经成为滦州民人经常使用的方法。如光绪《临榆县志》的作者就曾称滦州受补山、抚两卫屯田后,“滦民往往自称旗地,构讼夺地,案件频仍,县主皆照一地两养断结”^①;嘉庆年间,滦州民人贾永安赴户部呈称:其住处近滦河,“前有淤出地七顷余亩,向系身等种植资生。突有同族贾珂,勾通内务府镶黄旗人徐双宁,又有旗人张志等,冒认此地为伊等祖上遗漏之产,徐双宁勒令身等交租”^②;亦有滦州民人借旗分影射购买旗地之例,“讯据王汝梅供,小的老子王新在日,曾于乾隆二十五年借正白旗达连太旗分,用价银七百六十两置典年柱旗地九顷五十亩、草房十七间、瓦房一间。到了四十年上,达连太的孙子圣保恐怕有事,不肯借给旗分,叫小的父亲另转别的旗分影射,遂又借到正蓝旗皂保名下”^③。

可见,到清中后期,滦州民人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旗势”谋取私利或者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这多与清初的投充相关。就畿辅地区而言,早在清军入关之初就有部分汉人投充到旗人门下,随着三次圈地运动,最终形成了顺治年间的投充浪潮,所谓“汉人不论贫富,相率投充”^④。在投充的汉人中,一部分是无地贫民,投入旗下后能够按照人头分得一绳旗地,他们只能为主人耕种旗地;还有许多则是带地投充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土地外,还时常将他人土地并在自己名下投入旗下,这些人往往成为八旗庄园的庄头。研究者往往将这些庄头视为“夺人之田,攘人之稼”的地方大户或奸猾无赖,但是从史料来看,众地户将自己名下小块土地投献到某大户或庄头名下、作为“稍银地”共同投旗或以合族公产的形式投旗的现象都存在,如以下几例:

今指宝坻县民人王殿颺赴部呈称,小的祖上有坐落本庄民地四顷,因顺治二年准其民人带地投充,小的之祖意欲投旗,因地亩甚少,有投充庄头王朝义曾祖王公佩与小的家系亲戚,伊祖有民地百□□,急上内务府投旗报档。顺治三年,小的之祖与伊商量投旗之事,伊祖拦阻不必自投,与你代封,每年代封银三十六两,此地名目稍银地。^⑤

自庄头王承惠于顺治二年投旗,得投充庄头,奴才祖上开荒之地并未占圈,又不敢种无粮白地,所以投入王姓名下,历年交稍纳钱粮,每亩交清钱二百文,名为代封钱粮。^⑥

据内务府正白旗蜜户头目李二格赴部呈称,窃身高祖李国卿于顺治三年间,同合族四十六家将坐落乐亭县走马府等处共地九顷十二亩五分,投在内务府充当蜜户,有本府给发印照一张可凭,地亩仍系李姓各户承种,每年按亩出租,共交差银七两九钱二分,交与身高祖头目李国卿汇总,赴府交纳,由来已久。^⑦

从上引材料所揭史实可知,汉人投充者,既有贫困无着或担心土地被旗人圈占或被已投之人欺凌霸地而被迫为之,也有出于各种原因而自愿投充,其理由和形式相当多元。虽然学者也注意到清初汉人投充途径和目的的复杂性,但仍将投充视为“八旗官员霸占土地和获得人口的重要

① 光绪《临榆县志》卷15《赋役编·田赋》。

② 《内务府会计司呈稿》,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旗地》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330—1331页。

③ 《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嘉庆十六年二月初六日,《清代的旗地》下册,第1487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己巳。

⑤ 《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嘉庆二年三月七日,《清代的旗地》中册,第1042—1043页。

⑥ 《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嘉庆四年七月一日,《清代的旗地》中册,第1048—1049页。

⑦ 《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呈稿》,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一日,《清代的旗地》中册,第1074页。

手段,是另一种占有旗地和解决庄园劳动力的方式”^①,将清初的投充与清中叶以后常见的民佃旗地及抗租事件放置在民族压迫与反抗的模式下进行解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站在百姓日常生活的视角和立场,可能会对清初汉人投充的复杂性有新的理解。

正如上引 David Robinson 和 Michael Szonyi 的观点,清初直隶地区部分民人的投充与倚靠旗势,同样可以被视为地方社会私人庇护关系网络的构建以及运用此关系网络而“套利”的过程。康熙二十二年,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在上疏中称:“自鬻投旗之人,或有作奸犯科,冀逃法网者;或有游手好闲,规避差徭者。本主听其仍居本籍,放债牟利,则讳旗而称民;遇官长访问窝逃构讼等事,又舍民而称旗,抗避不出;甚或招摇乡里,鱼肉小民。”^②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孙嘉淦则讲得更加清楚:

直隶地方,旗民杂处,庄头壮丁,多系带地投充之人。当日投充之时,一家只报一名,则其余兄弟叔侄,尚系民籍,而皆朦胧影射,不纳丁徭。数传而后,子孙繁衍,支派难稽,是以有不旗不民之人。隐避差役,窝留奸匪,吏治不清,多由于此。^③

格尔古德和孙嘉淦都注意到,由于清初的投充,产生了大量游走在旗、民两种户籍身份之间的“不旗不民”之人,他们或者是亲身投旗之人,或者是庄头、壮丁的户下人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为了寻求利益的最大化,策略性地选择自己的身份是“旗”还是“民”。他们投旗或借用旗势,更多地是为了寻求一种庇护关系,从而成功地躲避差徭,或在犯事时逃过官府的缉捕,这些人与滦州知州口中那些“因拖欠粮草,或犯轻重罪名,一遇勾摄,逃入军屯,被其隐护”的州民是多么相似。所以,虽与 David Robinson 所论之“京畿盗贼”借助的制度资源及其王朝背景不同,但从百姓日常生计,或 Michael Szonyi 所倡言的“日常政治”角度而言,清代以后诸如借助旗势牟利的滦州人和直隶各地的“不旗不民”之人,与明代导致京畿地区成为盗贼渊薮的卫所武官、军户及避入卫所体制内的民户相比,二者的生存策略和生活逻辑却是惊人的相似并一以贯之。

五、结论

清朝建立之初,就着力于清理和整顿早已残破不堪的卫所军制和屯田,但改革的方式、路径和结果呈现出很大的区域性差异。在直隶地区,这一过程是以顺治年间的旗地圈占和拨补作为起点和契机的,为了补偿被圈占的“有主民地”,清廷将明代分布在直隶地区的大量卫所的“无主屯地”拨补给被圈州县。这些名义上是官田的卫所屯田,由于明中叶以来长期的转佃、典卖,其性质、产权形态和经营方式与明初相比,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确实存在一部分抛荒之地外,对于大多数拨补地,清政府都必须处理拨补卫所屯田时州县与卫所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并协调受补业主与包括屯军在内的原田主或原佃户之间围绕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发生的关系。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地两养”的经营方式,促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新的分离(这些屯田在明代已经产生了产权的分离),而租额与征纳钱粮的分离、拨补州县的代征也意味着明代卫所屯田以“飞地”形式存在于其他州县境内的情形仍在延续。但由于土地纠纷频仍,导致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并通过“退回”、“改买”等形式,最终实现了明代屯田的“私有化”和“民田化”过程。同时,围绕拨补地租和田赋的征收,直隶地区还形成了一套延续至民国时期的州县财政体制,并催生了新的地方基层社会组织。

① 赵令志:《论清初畿辅的投充旗地》,《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

② 光绪《畿辅通志》卷189《宦绩七·格尔古德》。

③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4《清查旗民疏》,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辑,第2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伴随土地制度和财政体制的变化,清代京畿地区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和人群组织方式也在发生改变,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从“军—民”二元体制到“旗—民”二元体制。在地方官的表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导致京畿地区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主因经历了从“军民杂处”到“旗民杂处”的转变,经济生态也由“军民争产”变为“旗民交产”,同样是屡屡构讼,纠葛不清。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变化?不管是国内学者对清初弊政的研究,还是国外的新清史学者,应该都会习惯于从民族政策或者“满洲”特性角度进行思考。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普通百姓应付日常生活需要的角度来看,建基于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八旗制度的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和管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对某些群体而言,都不过是在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可供利用的制度资源。那些“不旗不民”之人将清初圈地、投充过程中的“民族”意涵大大淡化,而从“军—民”二元体制到“旗—民”二元体制的“变”也就可以被消解在百姓如何与国家制度共赢的“不变”之生活逻辑中,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可能就变成了人们如何经历了两种制度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如何学习运用新的制度解决生活中出现的老问题或新问题。

概言之,清代直隶地区在旗地圈补过程中,以明代卫所屯田作为拨补地主要来源的做法,既推动了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又对清代直隶地区的土地制度、州县财政体制、基层社会组织、社会权力结构、人群组织方式等,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众所周知,明代州县与卫所的二元管理体制在清朝经过一百余年的调整,完成了合二为一的过程,但就直隶地区而言,这套二元管理体制下的民户与军户、民田与屯田的区分在被逐渐消解的过程中,民人与旗人、民地与旗地的二元体制又在逐步形成。这两个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二者之间也有着复杂的关联性。因此,清朝八旗体制形成及演变的历史,也可以被纳入明清卫所制度的框架内,并置于具体的地域空间,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References

- Ayao Hoshi. 明清时代交通史の研究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Traffic System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Periods). Tokyo: Yamakawa Shuppansha, 1971.
- Gugong bowuyuan mingqing danganbu (Archives Department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Palace Museum) ed. *Qingdai dangan shiliao congbia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rchives of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79.
- Gu Cheng. “Weisuo zhidu zai qingdai de bianqian” (The Changes of Ming Garrison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 (1988).
- Guo Songyi. “Qingchao zhengfu dui mingjun tuntian de chuzhi he tundi de mindihua” (The Qing government's disposal of the military land and its changes of the nature). *Shehui kexue jikan*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 (1986).
- Liu Hainian, Yang Yifan ed. *Zhongguo zhenxi falü dianji jicheng* (The Collection of Rare Legal Books and Records of Ancient China).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1994.
- Liu Jiaju. *Qingchao chuqi de baqi quandi* (The Enclosure for the Banner Lan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aipei: Wenshizhe chubanshe, 1978.
- Mao Yike. “Qingdai weisuo guibing zhouxian yanjiu” (A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Wei-suo Merging into Zhou-Xian in Qing Dynasty). Ph. D. Disser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2015.
- Robinson, David. *Bandits, Eunuchs, and the Son of Heaven: Rebellion and the Economy of Violence in Mid-M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 SudoYoshiyuki. 清代东アジア史研究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okyo: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 1972.
- Wang Yuquan et al., *Zhongguo tunken shi* (The Chinese History of Settlement and Reclamation). Vol. III, Beijing: Nongye chubanshe, 1991.
- Wang Yuquan. *Mingdai de junlun* (The Military Colonies of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9.
- Xie Shi. “‘Yitunyingmin’: Mingqing nanling weisuo juntun de yanbian yu shehui jiangou” (The Station Troops in Lingnan Area: Changes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Early Qing). *Wenshi* (Literature & History) 4

(2014).

Yi Baozhong, Chen Yufeng and Li Fan. *Qingdai manzhou tudi zhidu yanjiu* (A Study on Manchurian Land System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1992.

Yu Zhijia. “Mingqing shidai Jiangxi weisuo junhu de guanli yu junyi jiufe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litary Households and their Disputes over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Chiang-hsi Guards and Battalions during the Ming-Ch’ing Period).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72, Part 4 (2001).

Zhang Jinkui. *Mingdai weisuo junhu yanjiu* (A Study on the Military Households of the Garrisons during the Ming period).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2007.

Zhao Lingzhi. *Qingqianqi baqi tudi zhidu yanjiu* (A Study on the Eight Banners Land Syste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2001.

Zhao Shiyu. “‘Buqingbuming’ yu ‘wumingbuqing’ ——mingqing yidai de quyu shehuishi jieshi” (“Neither Qing nor Ming” and “No Qing without Ming” ——A Sociological-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Locality in Changing from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 *Xueshu yuekan* (Academic Monthly) 7 (2010).

Zhao Shiyu. “Weisuo junhu zhidu yu mingdai zhongguo shehui——shehuishi de shijiao” (Garrison, Military Household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he Ming Dynasty). *Qinghua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3 (2015).

Zhongguo renmin daxue qingshi yanjiusuo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t al., ed. *Qingdai de qidi* (The Banner Land of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9.

The Enclosure and Compensation for Banner Land and the Changes of Local Social Structure in Zhili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the Reform of the Garrison System

DENG Qing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dqpp78@163.co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 large amount of land in the capital region was occupied and allocated to banner household. The owners whose land had been occupied subsequently were compensated mainly with garrison land (*tun-tian*) from the Ming dynasty. This transition facilitated the reform of the garrison system in the early Qing, but also caused many new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putes over garrison land between the civilian and military systems. Because of the great distance between the new landowners and their newly swapped lands, a special form of land management called “one field, two supports” (一地两养) emerged, which meant that a piece of land fed two different families, the landowner and the tenant. The series of change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proprietorship and management of the land, the local fiscal system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Zhili provi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founding history of the Banner system has to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the Ming garrison system with a geographical dimension.